

从《唐人小说与政治》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李 菁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在我国新世纪的高校教学中, 不仅理工类专业要强调将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文科教学也亟待反映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给学生以明确的学术导向, 以便使之迅速接近学术前沿。鹭江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名师讲义”《唐人小说与政治》就是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多年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结晶。卞先生多年来成功地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研究唐人小说,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书既为高校“唐人小说”讲授模式改革提供了成功范例, 又为年青学子们研文治史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治学门径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高校教学; 唐代文学; 《唐人小说与政治》; “文史互证”法

中图分类号: I207. 41;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17(2004)01—0089—03

唐人小说是唐代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被宋人洪迈称为“小小情事, 凄惋欲绝, 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 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1] (P1)}当代学术界对唐代小说的研究日益深入, 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 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 在不少高校中文系为大学本科生开设的“文学史”课程中, 这些成就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甚至于在一些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中, “唐人小说”部分也被匆匆带过, 不加详述, 以至于出现教学实践明显滞后于科研的现象, 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于唐诗的极其繁荣, 因而在各种文学史教材中, 唐诗无一例外地占据着大量篇幅, 而艺术上足以与之媲美的唐人小说则被浓缩成一个章节, 显得很落寞。当然, 从编写者的角度看, 一本教材不可能做到笔墨均分、面面俱到, 有所侧重是在所难免的, 何况唐诗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但对唐人小说而言, 在有限的篇幅内, 要尽可能详细地反映最新科研成果, 就颇为困难了。因此, 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史教材在介绍唐人小说时, 大都是从其发展的初、盛、衰三个阶段入手, 谈兴起、繁荣、衰退的原因, 谈各阶段的主要作家和代表作, 谈其源流影响以及艺术特色等等。笔墨集中于中唐之繁荣期, 着重介绍《任氏传》、《枕中记》、《李娃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等名篇。在介绍这些名篇时, 一般先概述情节, 再分析主人公的性格,

然后归纳作品之内涵主旨, 最后是艺术成就。这种写法当然不无益处, 如条理清楚, 详略分明, 可使初接触唐人小说的学生对这种文学样式很快就获得大致的认识, 适合于打基础, 但难以生发开去。对希望进一步深造的研究生而言, 导师如果不另辟途径, 及时将学术界的科研成果与指导工作结合起来, 就非但不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而且会造成教学与科研的严重脱节。

我国著名文史学家卞孝萱先生作为“名师讲义”出版的新作《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 2003年6月)就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这部著作40余万字, 研究角度独特, 新见迭出, 成功地实践并推动了“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发展。诚如卞先生在该书《后记》中所说:“当代研究唐人小说者很多, 我独以文史互证的方法, 探求作者的寓意, 自出心裁, 不倚傍蹈袭, 发他人之所未发。”^{[2] (P494)}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开辟探索唐人小说之蹊径, 是卞先生一贯坚持的治学思路。卞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之多, 《唐人小说与政治》乃是其中最集中、最全面的一部。

众所周知, 20世纪以来的唐人小说研究,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其一, 立足于小说文本本身的分析。根据卞先生在其《唐传奇新探》中的归纳, 这类研究的特点是“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 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 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 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3] (P1)}这

收稿日期: 2003—11—23

作者简介: 李菁(1973—), 女, 江西南城人, 文学博士,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文学。

种模式通过对小说文本本身的关注,对作品的内容、思想、艺术表现等方面逐一进行分析,达到解剖和研究的目的。这一研究模式及其成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一些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如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等,迄今仍具有难以撼动的权威地位。目前我国高校中文系对唐人小说的讲授和指导,也基本上采用这种模式。其二,探索唐人小说与唐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挖掘出蕴含在小说深处的文化内涵。在这种研究模式中,研究者的视线能够跳出小说文本本身,关注的不仅仅是作品第一层面上故事情节的演绎,而更能从文化诸如宗教、社会习俗、科举制度、士林风气、唐代社会的商业化与城市化等角度切入,挖掘出小说更深层面上的文化内涵。这种模式的研究是对小说内容和思想研究的升华,与上一种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认,有较大的发展。

研究唐人小说的第三种模式,是由邓之诚、陈寅恪、缪钺等先生提倡的以文证史、“文史互证”法,具体而言,是“从唐人传奇文中,拈出政治、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以为研究的重心,别开‘文史互证’的新生面”,^{[4] (P167)}进行跨学科研究。“文史互证”法研究唐人小说的特点在于探求小说与当时政治之间的关系,寻找作品对政治背景、社会现状的艺术再现,挖掘出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政治寓意。这种研究方法是对学者之史学功底和学养的挑战,纵观“五四”以来的唐人小说研究,运用这种研究模式的学者屈指可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其高难度有关。卞先生数十年来致力于唐人小说的研究,一贯坚持的恰恰就是这种“文史互证”的方法。而这部《唐人小说与政治》,就是其“文史互证”法的成功实践,也是其辛勤研究之结晶。

试举一例而言:在该书第三部分《唐前期官僚倾轧的反映》之第三讲“《〈任氏传〉、〈枕中记〉:影射刘晏、杨炎》”中,卞先生指出:“唐代宗杀宰相元载,唐德宗杀宰相刘晏、杨炎。短短五年之内,连杀三个宰相。政治舞台上这样突出的事件,不可能在文学上没有反映,沈既济的《任氏传》、《枕中记》两篇传奇就反映了刘晏、杨炎相互倾轧的事实。”立论之后,卞先生即运用史实展开分析:刘晏与杨炎,都是元载引用的人,因为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元载被杀,是由刘晏讯鞠的;杨炎被贬,刘晏拍手称快,使杨炎对刘晏仇恨更深。刘晏被杀,杨炎算是为元载、也为自己报了仇,而杨炎最终又被卢杞诬陷而死。这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如何在

小说中得到反映,小说作者在作品中又寄寓了怎样的情感与意图呢?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卞先生从《旧唐书》卷149《沈传师传》中找到了《任氏传》与《枕中记》之作者沈既济与杨炎的渊源关系——后者对前者有知遇之恩——这层非同一般的关系便是沈既济承担起替杨炎辩解之责的动因所在。为使这种联系更具有说服力,卞先生先撇开《任》、《枕》两部小说不谈,而从沈既济撰《建中实录》之意图入手,以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所指出的《建中实录》“附(杨)炎之说”、“溢美,且欲附杨炎复河、陇之说”、“《建中实录》言炎罢相,与《德宗实录》颇异”三条结论,证明沈既济在德宗未死之前就抢先一步撰《建中实录》,其真正意图是在为德宗写实录的幌子底下,行替杨炎辩解之实。有这样的分析作基础,要考察《任》、《枕》两小说对刘晏、杨炎矛盾斗争的影射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卞先生接下去指出:“实录毕竟是史书。沈既济感到在实录中替杨炎辩解还是有限度的,不如写小说自由,可以影射、虚构、幻设,尽情渲染,而又不要负文责、担风险,于是《任氏传》与《枕中记》同时问世了。”沈既济创作《任氏传》,不是为了在人世间增添一段人狐之恋的佳话,而是要借狐之“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反讽刘晏对元载的背叛;《枕中记》表面上描写的是卢生的一枕黄粱美梦,实则取材于杨炎一生之为官经历,小说中卢生的官绩,实际上就是沈既济对杨炎生平遗憾的补足与美化。通过这样的剖析解读,小说创作的政治背景、作者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以及创作动机、创作意图便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从而使读者在赏析小说情节之曲折动人之外,更能领会它深层的思想涵义。^{[4] (P157-186)}

《唐人小说与政治》创见迭出,多发他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当然,这部书值得读者注意的不仅是奇思妙想,而更是卞先生为使这些观点令人信服所做的严谨扎实的考证工作。书中,卞先生遍引原始史料,多处列表格进行对比,条分缕析,逐层深入,使每一个论点都具有坚实的立足点。在立论以证的同时,或怀疑和推翻前辈的观点,如对陈寅恪先生关于《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某些观点的批评和补充等;^{[4] (P74-P80)}或对学界同行诸观点进行商榷和辨析,在在都体现了卞先生用史实说话,言之有据,不作空泛议论的严谨治学作风。在唐代小说的研究领域里,该书之出版,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它必将推动学术界“文

史互证”方法向更多的研究领域辐射、拓探。

《唐人小说与政治》这部著作除了具有学术价值之外,对于改革高校中文系唐人小说的讲授模式、提高教学质量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卞先生研究唐人小说的独特视角对年青学子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对此笔者颇有体会。笔者为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过“唐代小说研究”方面的选修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发现,如果按照传统模式,一路讲下来,学生的反应是毫不客气的冷漠。原因很简单,这些内容是他们在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就已然了解或者通过课后自修就完全能够掌握的,一个简单的电子软件检索指令,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不需要导师再费时费力去重复,而且这些内容也几成定论,难以进一步拓深。他们需要的是全新的研究视角,需要新说创见来开阔视野,刺激思维。基于此,笔者尝试着从小说与文化的关系、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分析作品,借鉴和引用了卞先生的一些观点,取得了良好的授课效果。

当然,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远在课堂之外,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年青学子治学方法的影响。透过小说华丽文采之表面,挖掘出其隐含的政治意图,这对于年青学子而言,不单单是研究唐人小说的新思路新方法,对于唐代文学的其他领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相当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以扎实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为基础,运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通过洞察创作者之“心胸”,挖掘出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推陈出新,并使这些新见依托翔实的史实,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而成为定论,使文学作品的研究得以向纵深发展,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年青学子完全可以遵循的一条治学之路,是可以朝着它努力的一个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卞先生对“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不独有不凡而成功的

实践,而且有推进和发扬之功。

史书的记载,不但可能有遗漏,有隐讳,有粉饰,而且多是历史人物的表面活动,只有从文学作品,才能看出当时人的内心活动。言为心声,一人之诗文,可见一人之心,一时代之诗文,可见一时代之心。文史互证,可以补充史书之缺失,纠正史书之讹误,亦可开阔视野,真正读懂文学作品之内涵。对年青学子而言,开拓思维,不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多角度多层次地思考问题,才有助于将问题看深看透,有助于在科研方面出新、出精。研究唐人小说如此,研究其他课题亦不例外。在我国新世纪的高校教学中,不仅理工类专业要强调将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文科教学也亟待反映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给学生以明确的学术导向,使之迅速接近学术前沿,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学术钻研能力。因此,高校中文系的“唐人小说”讲授模式,完全可以《唐人小说与政治》的出版为契机,进行改革尝试。《唐人小说与政治》不仅是一部学术力作,而且还是鹭江出版社出版的“名师讲义”丛书之一,书中每一部分每一讲就像是卞先生亲自在授课,在传授治学方法,在启发学子思维,开拓学子思路,这不正是科研成果与高校教学实践密切结合的成功范例吗?

参考文献:

- [1] 陈世熙. 唐人说荟[M]. 搢秀轩刻本, 乾隆五十七年.
 - [2] 卞孝萱. 唐人小说与政治[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3.
 - [3] 卞孝萱. 唐传奇新探[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 [4] [新西兰] 陈珏. 初唐传奇考[A]. 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C].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 (责任编辑 丁 鼎)